

第五章 新現實主義的驗證

小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在九一一事件前後有著明顯的改變與調整，這些改變與調整是九一一事件的影響，間接造成美中關係的變化，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觀察，九一一事件導致國際社會主要構成員（國家）之間權力—能力及地位的改變，間接造成體系結構的改變，而體系結構的改變相對的也會影響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關係。不論是在全球層次或亞太區域層次，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變化。本章從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檢視小布希政府時期美中關係變化，進而觀察新現實主義下美中關係的變化對兩岸關係之影響，最後再探討新現實主義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的適用性。

第一節 新現實主義下的美中關係

新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一樣認為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社會中主要的行為體，國家會以理性的行為去追求其利益，而國家最大的利益便是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為了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國家便須追求權力。但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權力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國家追求權力的目的是保障安全，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在解釋國際政治現象時，應自權力的全般配置來觀察，而不應只從一、二件個別事件上受到權力控制的影響去衡量。¹另外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構成員（國家）之間權力—能力地位的改變，將造成體系結構的改變，而體系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關係。²

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權力平衡所要解釋的是「結果」(result)，權力平衡會一再重覆的形成，而且雖然這個結果是由許多國家的行為所造成的，但並不一定符合每個國家的意圖，³換言之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必然形成的最後現象，整個國際政治結構不論某些個別國家權力的消或長，也不論這些國家的意願如何，仍然會形成平衡的狀態。⁴當權力分配改變時，體系結構雖然也會改變，不過改變的結果是形成及維持另一個新的權力平衡，也就是說體系結構的改變由原來的權力平衡改變成另一個權力平衡狀態，這與古典現實主義將權力平衡視為一種過程是不同的。⁵

¹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126.

²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政治—體系變遷與美中台三角關係》(台北:時英, 2002年), 頁83。

³Ibid., p.119.

⁴吳東林, 前揭書, 頁85。

⁵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另外新現實主義認為系統結構的影響來自系統構成員的社會化及構成員間的相互競爭，⁶社會化和競爭所形成的規範促成系統結構的運作，在沒有人為的操縱下，構成員彼此之間能逐漸相互適應，即使構成員的特性和互動關係有所差異，不同的結構也可能造成相同的後果，系統結構可能影響構成員所具有的特性和互動關係。⁷本節即以「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面向觀察九一一事件前後全球層次下的美中關係、以「權力平衡是必然形成的現象」面向觀九一一事件前後亞太區域中的美中關係、以「構成員的社會化和競爭促成構成員融入國際社會」面向觀察觀察中國大陸角色的變化與調整。

一、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

瓦茨認為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根本的差異在於「無政府狀態」和「層級節制」，⁸國內政治是「有政府的政治」，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的政治」，⁹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政治結構中構成員的相對位置（即構成員的地位分配）、能力及權力分配狀況極為重要，瓦茨甚至認為「構成員的地位分配」即是結構的定義，只有在相對地位發生變化時結構才會改變，¹⁰每個國家的能力決定他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及對結構的影響，所以當國家能力及地位分配發生變化時，國際政治結構就會改變，¹¹國家間權力分配狀況的改變造成系統結構的變化，結構變化亦相對的導致國家行為的改變。

小布希上任初期到九一一事件前國際體系基本上維持「一超多強」的格局，但是在所謂的多強中實力都無法與美國相匹敵，歐盟統合後雖然成為龐大的政治經濟體，具有相當程度的經貿實力，不過在執行國際安全任務時，歐盟充其量僅能作為美國等強權的輔助角色，無法等同於主權國家成為國際舞台上的要角。¹²日本的幅員及資源不足，並且依附在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之下，難以脫離美國而躍居國際體系的強權。俄羅斯則一直無法重振前蘇聯的強權地位，尤其是在面對北約東擴時俄羅斯無法阻止美國在歐洲的勢力擴張，已不再是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世界強權。中國大陸則歷經十餘年的建設發展，成為具備綜合國力的強權，取代前蘇聯的角色，在全球與美國抗衡，新的兩極平衡體系隱約出

York:Knopf,1967.4th ed) , p.178.

⁶Waltz,op.cit.,p.73.

⁷Ibid.,pp.75-76.

⁸Ibid.,p.38.

⁹Ibid.,p.88.

¹⁰Ibid.,p.55.

¹¹Ibid.,p.93.

¹²吳東林，前揭書，頁 240-241。

現。這是國際體系構成員權力地位的重新分配，改變了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形成了世界重心轉移至美、中兩強的新體系特質，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實力尚不足以完全主導國際事務，與美國抗衡，對於國際事務的處理，必須藉由歐盟、俄羅斯及日本的力量共同協助解決，這是構成員權力重新分配後改變體系，而改變後的體系反過來又影響了構成員的互動關係的印證。

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雖然仍維持「一超多強」的格局，但因為美國倡導成立全球反恐聯盟，使國際體系中各主要強權國家間關係產生變化：首先是北約東擴：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七國加入北約，將「歐洲的自由安全區」(Europe's zone of freedom and security) 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¹³北約已將東歐國家完全吸收，北約的擴張勢將為中國大陸西部帶來威脅，中國大陸遭受極大的壓力。

其次是歐盟東擴：2004年5月1日波蘭、匈牙利等10個國家加入歐盟，歐盟從15國擴大到25國，人口從3.7億增加到4.55億，擴大後的歐盟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不僅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體和獨一無二的政治體，而且將成為可與美國競爭的對手。擴大後的歐盟似乎將力爭改變冷戰時期確立的「美歐主從關係」，不但將與美國爭奪歐洲主導權，還要增加歐洲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無疑將加劇美歐在政治、經貿及至軍事領域的摩擦、競爭和矛盾，同時也給了中國大陸與歐盟建立密切關係，運用多極力量制衡美國霸權的機會。

另外美俄關係改善建立了「新型的戰略框架關係」，日本在二戰後首次派兵海外並在美國支持下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以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南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向美國靠攏，中亞國家如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等中亞國家將軍事基地或領空提供給美國使用，甚至俄羅斯國軍隊開進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同美國軍隊一同出現在中國大陸的腹背，俄國向北約組織邁進，使得上海合作組織有被廢武功之虞，¹⁴對美中關係亦造成影響。綜合分析九一一事件後的國際體系變化，美國所建構的國際反恐聯盟對中國大陸所推動的大國外交政策造成了衝擊，此一「大國關係夥伴化、夥伴關係空心化」的轉變，¹⁵對於中國大陸長久苦心經營的大國外交，影響可謂相當不利，也說明了新

¹³遠景基金會，《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5。

¹⁴陳奎德，《九一一事件與中國外交》(BBC News中文網，2001年10月17日)，轉引自施子中、王文賢，《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三角關係之演變與對我之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04。

¹⁵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兩岸安策略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

現實主義理論中構成員權力的重新分配和相對地位的改變，將會對構成員的互動產生影響，甚至會影響到體系，九一一事件後各主要強權國家關係的變化，對國際體系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從九一一事件前後的國際體系變化與各主要大國間關係的變化，印證了新現實主義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理論的適用性。

二、權力平衡是必然形成的現象

瓦茨認為權力平衡現象一直存在國際社會中，只要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努力在無政府狀態求生存，權力平衡的情況便會發生，¹⁶不管國家是否願意，他們還是維持了權力平衡的狀態，因為不論國家是否有權力平衡的動機，都會採取有助於權力平衡的舉動，所以系統結構有向權力平衡情況發展的強烈傾向，權力平衡理論並不是談權力平衡的狀況可以維持多久，而是說如果權力平衡受到破壞，遲早會以另一種風貌重新出現。¹⁷

九一一事件前中國大陸雖然崛起成為世界主要強權之一，但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無法與前蘇聯時期相比，唯在亞太地區基於地緣戰略的因素，中國大陸崛起後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不容忽視，甚至有與美國競逐亞太地區主導權之態勢。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昇，加上其外交政策傳統上重視週邊國家，隨著其國力提昇，中國大陸積極推動與週邊國家的關係，其中與俄羅斯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最為重要，同時 2001 年相繼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企圖主導亞洲事務相當明顯，中國大陸藉由推動、成立多邊對話機制，擴張其勢力，並企圖以中俄同盟抗衡美日以美日安保條約為核心的美國勢力，美中在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結構的競爭，在美中撞事件達到白熱化，亦影響了美中台三角關係，直接促成美國對台灣歷年來最大規模的軍售。

九一一事件後美中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競逐並未因雙方「建設性合作關係」而有所改善，相反的隨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持續，美中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競逐愈形白熱化，首先是美俄關係的改善，九一一事件為美國與俄羅斯雙方關係發展提供新的契機，美國基於中亞地區反恐戰爭軍事部署，必須爭取俄羅斯的同意與配合，俄羅斯則基於東西平衡的外交戰略考量，希望改善與美國關係以改善國內經濟發展並藉美國制衡中國大陸，基於前述的共同戰略利益，美俄兩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建立了新型的戰略合作關係，另外俄羅斯與美國簽訂「裁減核武條約」的協定等於俄羅斯默許美國部署「全國導彈防禦系統」(NMD)，以

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92 年)，頁 56。

¹⁶Ibid.,p.122.

¹⁷Ibid.,p.128.

及在亞洲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作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一部份。¹⁸美俄關係的改善，對中國大陸欲藉上海合作組織鞏固中亞與俄羅斯關係以抗衡美國的企圖不啻是一項挫折，從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關係變化，可觀察到中國大陸企圖以中俄同盟平衡美日同盟，俄羅斯亦企圖以美俄關係改善平衡中國大陸的崛起，而美國亦企圖經由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三者間的關係充分印證了不論國家是否有權力平衡的動機，都會採取有助於權力平衡的舉動，所以系統結構有向權力平衡情況發展的強烈傾向。

除了俄羅斯之外，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更藉反恐戰爭提昇美日安保條約的實質關係成為「在全球脈絡下的美日聯盟」(U.S.-Japan alliance in the global context)，¹⁹2003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在日本國土部署彈道導彈系統，並從2007年開始實施。2004年3月美國政府準備將位於美國西海岸華盛頓州路易士堡的陸軍第一軍司令部轉移到日本神奈縣的「座間基地」，²⁰顯見美國欲藉反恐戰爭協助日本提升其國際地位，以利在亞太地區制衡中國大陸。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亞太地區、南亞及中亞的軍事部署，隱約已形成對中國大陸東西兩面的戰略包圍態勢，尤其是北京對美國與印度潛在的軍事同盟關係深感憂慮，因為此一關係若與美日同盟結合，美國即可配合亞洲兩大強權將中國大陸牢牢箝住，以貫徹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目標—「保持其主導地位與區域強權間的平衡，並防止中國大陸在區域影響力的崛起」。²¹

綜合上述分析，九一一事件後的亞太地區主要的結盟行為仍是以美中兩國為主軸，在彼此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縱連橫，而這些的合縱連橫，只是亞太地區美中權力平衡的另一種風貌，如兩手策略、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等，美中在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的角逐不會消失，只是轉換成某種型式而已。從美中雙方在九一一事件前後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與競

¹⁸施子中、王文賢《911事件後美中俄三角關係之演變與對我之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12。

¹⁹「在全球脈絡下的美日聯盟」(U.S.-Japan alliance in the global context)概念，指美國和日本在政治、安全、經濟和全球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寬廣的範圍中，建立明顯相互依賴和合作的關係。詳見遠景基金會，《亞太綜合安全年報2003-2004》(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59。

²⁰遠景基金會，《亞太綜合安全年報2003-2004》(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169。

²¹W.R.Hawkins, "Challenging Chessboard of Asia",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8, 2002, p.21.轉引自默漢·馬克力(Mohan Malik),《龍困淺灘—九一一之後中國大陸的戰術收獲與戰略損失》(Dragon on Terrorism-Assessing China's Tactical and Strategic Losses Post-September 11)(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台北，民93年)，頁38

爭，印證了瓦茨所說的權力平衡現象一直存在國際社會中，只要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努力在無政府狀態求生存，權力平衡的情況便會發生。²²

三、構成員的社會化和競爭促成構成員融入國際社會

瓦茨認為系統結構的影響來自於系統構成員的社會化及構成員的相互競爭，²³這兩項是是體系結構的核心因素。²⁴兩者都鼓勵構成員有相似的特質和行為，體系構成員的社會化和相互競爭，使得體系結構得以順利的運作，而且兩者都鼓勵和促進構成員融入團體中，並採取類似的行為，團體最後將規範和限制構成員的普遍行為表現。此外基於理性的選擇，如果構成員無法適應或不遵循大多數成功的規範，構成員只有選擇重回團體或遭致淘汰。²⁵換言之，社會化限制和形塑社會成員的行為，而競爭則促使成員調整他們想法及行為，最後成為一種大家共同遵守的秩序。²⁶

中國大陸在小布希政府時期社會化最重要的指標是 2001 年底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構成員相互競爭最重要的指標是中國大陸在倡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組織，藉由這些作為，中國大陸積極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成員。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擁有十二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潛力，將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提供一個龐大的市場經濟體制，預期將有助其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能力。依據中國大陸內部學者的看法，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中國大陸做出二個最重要的承諾，一是中國大陸願意遵守國際規則，一是中國大陸願意逐步開放自己的市場，這兩個重要承諾對討論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無論多麼強大，如果這個國家願意遵守國際規則並願意承擔自己的國際義務，那麼這個國家永遠不可能成為對世界的威脅。²⁷顯見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亦存在戰略考量，即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顯示中國大陸願意接受國際規範的約束，而這種願意接受約束的戰略涵意就是中國大陸的強大與崛起不會是種威脅。

2001 年 6 月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太區域相互競爭的具體象徵，亦說明了進入 21 世紀美中兩強在國際體系中藉各自結盟以相互抗衡的事實。2001 年 6 月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

²²Ibid.,p.122.

²³Ibid.,p.73.

²⁴Ibid.,p.73-74.

²⁵吳東林，前揭書，頁 89。

²⁶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民 86 年)，頁 73。

²⁷BOAO FORUM FOR ASIA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boao/551987.htm>2005/11/1

烏茲別克等國家，在「上海五國」的基礎上簽署了「上海宣言」，正式成立區域性的多邊合作組織，根據上海宣言，上海合作組織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及對外開放的原則，旨在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並願與其他國家和有關國際與地區進行對話和交流及合作，²⁸另外蒙古、印度及巴基斯坦亦示有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²⁹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均希望藉此一組織結合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的勢力與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抗衡，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勢力進入中亞，改善與印度巴基斯坦關係，對中國大陸形成東、西、南三面戰略包圍態勢，中國大陸更需強化上海合作組織來突破美國的包圍同時確保能源獲得的安全，未來亦不排除上海合作組織將成為阻擋北約擴張的主要勢力。³⁰

小布希時期的美中關係發展，不論在全球層次或亞太區域層次，均跳脫不了新現實主義「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權力平衡是必然形成的現象」的理論架構，換言之，新現實主義中的體系結構及權力平衡理論至少一部分有力的詮釋 2001-2004 年美中關係的發展及現象。另外中國大陸藉由社會化和競爭融入國際社會，並藉由聯合國安理會機制的運作、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等區域合作機制及多邊對話機制，甚至在 2005 年主導舉辦「東亞高峰會」將美國排除在外，³¹充分顯示提昇其國際影響力及國家形象，進而與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抗衡的企圖，亦印證了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社會化和相互競爭的相關論點。

第二節 新現實主義下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美中關係不論在全球層次或亞太區域層次的競爭與合作，都是環繞權力平衡的核心問題，依據新現實主義理論，不論美國與中國大陸是否在政策上刻意追求或是有所企圖達成權力平衡的狀態，且不論美中兩國是否願意導致權力平衡，最後都會形成權力平衡的結果。另依據新現實主義理論，體系是由結構及構成員二者組成，而其核心就在於構成員的能力，構成員能力的大小決定其對體系結構的影響力，只有能力強大的構成員才能影響體系，換句話說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強權國家決定，非強權國家只能依附於強權所決定的體系，而所謂

²⁸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2002年），頁 293-296。

²⁹朱維瑜，《2002年世界年鑑》（台北：中央通訊社，民 90年），頁 628。

³⁰吳東林，前揭書，頁 319。

³¹東亞高峰會預於 2005 年 12 月與吉隆坡召開，16 個與會國家中有 15 個是 APEC 會員，美國未獲邀請與會，高峰會主要目的在藉成立區域性自由貿易區進而建構東亞共同體，若該峰會具體成形，APEC 將被架空虛級化，中國大陸可藉此站上區域老大地位，將美國推出亞洲。中國時報，民 94 年 11 月 14 日第 13 版。

強權，乃是因為具備較大之能力，使得他們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與其他行為者不對等（較強大）的角色，所謂非強權（或較不強大的國家），則是結構理論所提到之必須依從強權（命令）所行動的屈從者。³²從此一角度觀察台灣的角色相較於美中兩大強權，屬非強權國家，不可避免的必須依附於美中關係的變化，也就是說美中關係是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的主變項，美台關係及兩岸關係是依變項，美中關係的改變，必然造成美台關係及兩岸關係的連動，這是美中台三角關係結構的特性。

一、九一一事件前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一）競爭大於合作的美中關係

小布希上任至九一一事件前的美中關係，因小布希政府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在全球層次中中國大陸是一個不滿現狀的國家，同時亦存在尚未解決的利益衝突—台灣問題，所以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挑戰，在亞太區域層次中國大陸不願意美國在亞洲駐軍，以限制其向海洋發展，兩大強權在亞太地區存在潛在衝突的因素，所以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在這樣的結構因素下，美中關係中的競爭成分多於合作的成分。2001年4月1日的美中撞機事件，使雙方關係日益緊張，雖然事後雙方均尋求緩和彼此間緊張的關係，但因為結構因素而成效不彰。在這樣的關係下，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除了一貫主張的三公報及台灣關係法外，更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勢。小布希總統在4月23日同意對台歷年來最大規模軍售及4月25日ABC電視台「早安美國」節目中表不將不計一切代價協助台灣的講話，都顯示此一事實，也加深了中國大陸對美國運用台灣制衡中國大陸的看法，即使如此，中國大陸基於其本身「穩定發展」的戰略考量，極力維持對美關係「鬥而不破」的格局，在這樣的美中關係下，兩岸關係亦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二）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1 政治上的各說各話：

九一一事件前由於小布希新政府對中國大陸的強硬態度，使美中關係陷入低潮，加上美中撞機事件，使美中關係益形緊繃，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受到這些因素影響，對台灣採取了較友善的態度，不僅對台灣大規模軍售，同時對台灣領導人過境美國給予禮遇，這些都與柯林頓政府的政策有相當程度的不同，美國的這些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鼓舞了台灣政府，使台灣政府在處理兩岸事務上更具信心，中國大陸則受到美中關係緊繃的影響，在處理兩岸事務上仍然堅持一貫強硬的立場，此一立場除了一貫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外，更有藉台灣問題

³²Jack Donnelly,《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高德源譯(台北: 弘智, 2002年), 頁200。

表達中國大陸對九一一事件前美中關係的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在政治上形成各說各話的局面。

兩岸政治議題的核心在「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兩岸在 2000 陳水扁上任後，在民進黨台獨黨綱的激化下使此一議題愈加發酵。2001 年 1 月 1 日台灣開始實施小三通，企圖以先經貿後政治的手段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的正常化，³³中國大陸則強調兩岸三通應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³⁴2001 年 5 月陳水扁訪問中南洲提出兩岸「新五不政策」企圖打開兩岸僵局，中國大陸則表示台灣當局領導人如果真有誠意和善意，就應該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只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在承認兩會共識前提下，兩岸才能恢復談判。³⁵兩岸在政治議題上仍停留在「一個中國」的爭議上，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議題，其內涵是可以討論的，中國大陸則認為「一個中國」是前提也是原則，兩岸須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此一前提下始可展開談判，兩岸間各說各話，沒有交集而陷入僵局。美國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以及明顯的向台灣傾斜的對華政策，使美中關係趨於緊張，亦讓台灣堅定其信心，在政治議題上各說各話，而中國大陸亦在台灣問題上表達堅定立場，印證了兩岸關係受美中關係制約而連動。

2 軍事上的持續對抗：

美中撞機事件使美國更加堅定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對手」的看法，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基於戰略上制衡中國大陸的考量，小布希政府決定了歷年來最大規模的對台軍售案，此一軍售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須從亞太地區全般戰略格局觀察：

第一是美國軍售台灣可以維持兩岸軍事平衡，不僅符合台灣的利益更符合美國的利益。³⁶

第二是藉由紀德級驅逐艦及愛國者三型飛彈的指管系統及資料鏈路的連結，及未來將台灣納入TMD等，使台灣能運用C⁴ISR與美軍太平洋艦隊連結，³⁷使美台

³³蔡政修，〈五二〇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與兩岸政治談判前景〉，《問題與研究》，42 卷 1 期（民 92 年 1、2 月），頁 78。

³⁴錢其琛，「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江澤民主席《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重講話發表六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1 年 1 月 22 日。轉引自蔡政修，〈五二〇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與兩岸政治談判前景〉，《問題與研究》，42 卷 1 期（民 92 年 1、2 月），頁 78。

³⁵古直，〈2001 年兩岸關係〉，《中共研究》，36 卷 2 期（2002 年 2 月），頁 78。

³⁶劉東方，〈美國對台軍售和兩岸關係的調整〉，《明報》，36 卷 6 期（2001 年 6 月），頁 88-89。

³⁷楊運忠、馮金平，〈21 世紀美國安全戰略與中美關係〉（濟南：黃河出版社，2004 年），頁 289。

間逐步向「準軍事同盟關係」發展。³⁸

第三是美國對台軍售主要是加強台灣的制海能力，是美國預防性戰略中制約中國大陸的一種手段。

第四是結構性的戰略問題，即中國大陸從陸權走向海權的過程勢必會影響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利益，甚至全球的戰略格局都會因為中國大陸建構走向太平洋的能力而遭到影響，美國必須予以圍堵，而台灣的地緣正位於此一圍堵戰略的重要位置。

對於此一歷年來最大規模的對台軍售案，使中國大陸備感威脅，其原因有三：一是就軍事層面而言軍售案將增強台灣防衛能力，相對的增加爾後武力犯台的難度，若台灣全數接受，兩岸間的軍力平衡將受到影響，中國大陸逐漸拉大的軍力優勢將會喪失。二是就戰略層面而言美台藉軍售建立C⁴ISR鏈路的連結，等同於走向實質的軍事同盟，亦表示美台間的軍事合作較以往突破，未來中國大陸所面對不只是台灣，而是美台同盟，甚至是美日台同盟。三是就政治層面言，軍售案顯示的訊息是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向台灣傾斜，此一政策某種程度將對台灣主體意識產生鼓舞作用，危及中國大陸主權及領土的完整。基於軍售案對中國大陸的威脅，中國大陸於2001年6-8月於東山島舉行歷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1996年飛彈危機為演習想定，其針對性及目的性極為明顯。

美中撞機事件促成了美國對台軍售，美國對台軍售又促成了中國大陸的軍事演習，再次說明了美中關係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的關鍵地位，美中關係的變化必然牽動到兩岸關係的互動，從軍售案及兩岸間軍事的持續對抗再次印證了此一假設的合理性。

二、九一一事件後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一) 合作大於競爭的美中關係

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撞機事件後，雖然雙方均能就全般戰略情勢考量自我克制，使事件圓滿落幕，但此一事件亦曝露出美中兩個主要強權間在現實的戰略利益下潛藏的不穩定、衝突因素，2001年7月美國國務卿鮑爾訪問北京試圖緩和撞機事件以來的緊張關係，但成效有限。九一一事件給了美中雙方一個機會，美國基於反恐的考量，需要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支持，身為世界主要強權國家之一的中國大陸，更是美國爭取合作的對象，中國大陸則基於一貫的「和平穩定發展」的戰略考量，當然不會放過此一與美國合作改善關係的機會，美中關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戰略競爭對手」向「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

³⁸楊運忠、馮金平，前揭書，頁283。

九一一事件後的國際情勢雖然使得美中關係獲得改善，但美中間複雜的結構性矛盾，卻使美中關係潛藏著不穩定的因素，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不僅是考慮對恐怖主義的制壓，同時亦考量到「地區潛在對手」的預防，從美國在阿富汗清除塔利班政權後不僅不撤軍反而成立軍事基地、³⁹加強亞太地區同盟國雙邊軍事關係、改善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關係，抵消中國大陸對中亞及南亞的影響力，凡此種種作為，均已超過反恐戰爭的範圍，顯示美國藉反恐之名，對中國大陸行圍堵之實，亦充分曝露出美中間戰略上的結構性矛盾。美中之間雖然存在結構上的矛盾，但對中國大陸言，在其實力尚無法單獨與美國抗衡之前，通過反恐建構一個合作大於分歧的中美雙邊關係結構，有利中國大陸之發展，⁴⁰同時亦可經由美國制約台灣內部的自主意識的提高。在美中共同的戰略利益考量下，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關係合作大於競爭，兩岸關係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亦產生了重要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對台灣政策的調整，由禁止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到尋求與美國共同管理台灣問題。

（二）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在美中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下，兩岸關係亦受到影響，最主要的影響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大陸戰略地位的提昇與台灣戰略地位的下降，使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存度提高，二是中國大陸改變對台灣政策，三是美國干預台灣內政，使台灣獨立自主的空間受到壓縮。

1. 中國大陸戰略地位的提昇與台灣戰略地位的下降使台灣對中國大陸依存度提高：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成立全球反恐聯盟，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且是國際體系中的強權之一，自然是美國極力爭取支持的對象，同時中國大陸是亞太地區的主要強權，對穩定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具關鍵地位，在美國全力反恐之際，極需中國大陸協助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定，另外中國大陸與小布希眼中所謂的流氓國家關係良好，對美國極欲達成的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戰略目標扮演重要協助角色，尤其是對於東北亞的北韓核武問題，美國更是必須尋求中國大陸的協助處理，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的改變詮釋了新現實主義構成員的權力分配結果影響了未來體系的發展，而新的體系結構反過來又影響了構成員的互動關係，就在這種改變下，中國大陸不論在全球層次或亞太區域

³⁹美國在阿富汗鄰近九個國家成立了十三個軍事基地。詳見裘兆琳，〈美中台三角關係之挑戰與國家安全〉，收錄《台灣安全戰略評估 2003-2004》，丁渝洲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3 年），頁 148。

⁴⁰張雅君，〈中共反恐外交的實踐與成效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8 卷 1 期（民 94 年 3 月），頁 66。

層次的影響力大幅提升，戰略地位亦隨之提昇，而中國大陸亦妥為掌握此機會，於十六大後積極推展大國外交，⁴¹欲藉由大國外交提升地位，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⁴²而事實中國大陸近期的作為亦顯示其大國外交已達到預期目標。⁴³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戰略地位提昇，台灣的戰略地位卻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造成這種趨勢係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的交互影響所導致。外部因素是因為美中台三邊結構改變，美中關係由「潛在戰略競爭對手」向「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中國大陸的角色從對手轉變為支持者與協助者，在全球反恐戰爭與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上美國均需要中國大陸的協助，在這樣的戰略需求下，原先台灣所扮演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地位已不再是美國優先考量的事項，甚且美國亦希望台灣能在台灣海峽扮演積極的角色，即不挑釁中國大陸，不製造台海事端，為維護亞太和平穩定而努力，在美國政策的調整下，台灣的戰略地位相對於中國大陸就呈現下降的現象。就內部因素言，台灣政府未能體察九一一事件後美中關係的變化或昧於形勢，企圖以制憲、公投等議題謀取政治上的利益，而違背了美國前述的期望，成為危害亞太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與中國大陸兩相比較，台灣的戰略優勢自然逐漸流失。這種戰略優劣勢的相對變化在經濟方面最為明顯，由於兩岸政冷經熱的特殊發展，使台灣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大陸，以 2004 年為例，根據陸委會的統計，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佔全部貿易順差的 461%，⁴⁴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支撐，台灣將成為貿易逆差國家，顯示台灣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大陸，這種依賴已到達危害台灣安全的程度。

2. 中國大陸對台灣政策的轉向-聯美制台政策的形成

90 年代中國大陸宣布對台動武時機有三：⁴⁵一是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二是台灣宣布獨立，三是台灣島內發生動亂。當時中國大陸認為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是對中國大陸的主權的侵犯，危害到其生存利益，必須以軍事力量予以

⁴¹中國大陸推動大國外交係認為國際體系的運作主導權在大國，欲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必須搞好與大國間的關係，唯有積極與大國發展關係，才能使中國大陸躋身大國甚至強國之林，中國大陸此觀點顯示中國大陸在處理對外關係有朝向新現實主義發展的趨勢。

⁴²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42 卷 3 期（民 88 年 3 月），頁 52。

⁴³2005 年 10-11 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先後訪問加拿大、墨西哥、北韓、越南、英國、德國、西班牙、南韓，挾強大的經濟優勢開展全方位外交，用大量經援北韓，使六方會談獲得進展，使得北韓美國欠中國大陸人情，用東協各國農產品免關稅，達成和東協各國親善，再用免關稅、貸款獲致阿富汗、巴基斯坦及非洲開發中國家的支持和友誼。聯合報 94.11.18A13 版

⁴⁴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表第 153 期，表七台灣對中國大陸香港及全球貿易順差統計。網址：<http://www.moc.gov.tw/big5/statistic/em/153/7.pdf>

⁴⁵胡平，〈中共對台政策何處去〉，大紀元網站：

<http://www.epochtimes.com/gb/4/2/16/n467815.htm>，2005/11/8

捍衛；同時中國大陸認為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應由中國大陸自行處理，國際勢力不應介入，一直到李登輝執政時期，中國大陸還是維持這樣的戰略思維，所以李登輝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以凸顯台灣主權問題，引起兩岸緊張，最後導致 1996 年飛彈危機。

1996 年飛彈危機在美國派出二個航母戰鬥群介入的壓力下化解，中國大陸在軍事上遭受挫折，但在政治上卻有所體悟，即從北京到台北最短的距離是經由華盛頓，美國對台灣具關鍵影響力，只有利用美國這個槓桿，才能達到中國大陸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目標，即防止台灣獨立的發生與經濟上牽引住台灣，⁴⁶任何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方式沒有美國的認同，只會導致美中的衝突，這樣的結果將危及中國大陸和平發展的戰略利益，且無益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所以中國大陸逐漸調整其對台政策，不僅同意美國介入台灣問題，亦將台灣問題國際化，而其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具體做法是將台灣問題歸為亞太地區不穩定的因素，而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並不是由中國大陸造成的，而是由台灣所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除了同意美國介入台灣問題外，更希望與美國共同管理台灣問題。如中國大陸對美國邀請台灣國防部長訪美、護照加註台灣等動作，並未如以往的反應激烈，而台灣公投問題、制定新憲法主張等，中國大陸更是可以好整以暇的透過美國向台灣表達關切或做禮貌性的提醒，從而化解掉台灣獨立與公投的政治壓力，⁴⁷胡錦濤與小布希在紐約見面時更主動提出：「希望美國與中國大陸一道保衛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並反對所謂的台灣獨立」，⁴⁸顯示中國大陸已放棄禁止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的立場，並願意與美國共同管理台灣問題，亦顯示中國大陸逐步落實聯美制台的政策。

3. 美國干預灣內政

2002 年 8 月 3 日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⁴⁹破壞了「兩國論」危機以來重建的美台互信，2003 年台灣政府同意在 2004 年總統大選時同時辦理「核四公投」讓美國頗感困擾，使得華府認為台灣變得愈來愈捉摸不定，甚至有些失

⁴⁶高哲翰、黃秋龍，《兩岸關係中的國際反恐主義因素》（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2 期，民 92 年 12 月），頁 30。

⁴⁷高哲翰、黃秋龍，前揭書，頁 30。

⁴⁸2005 年 9 月 15 日胡錦濤在紐約與布希見面時正式於官方場合提出此一說法。聯合報 94 年 9 月 15 日頭版。

⁴⁹陳水扁於 2002 年 8 月 3 日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 29 屆年會中致詞，提到所謂的一邊一國論，陳水扁說：「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能被欺負、被矮化、被邊緣化和地方化，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台灣也不能成爲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爲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簡言之，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

控。⁵⁰ 2003年12月布溫會後，美台之互信基礎受到衝擊，台北拒絕了美國之要求，堅持在2004年3月辦理公投，並要求北京撤除飛彈，小布希總統公開反對台灣領導人的言行，使得美台關係受損。台灣的行為尤其是公投制憲觸及華盛頓敏感的政治神經，2008建國論則更不用說，且事先未能獲得美方諒解，一意孤行更導致美國史前無例的干預，因為美國了解與中國因台灣問題而產生軍事衝突的嚴重性，所以對兩岸之間的預防外交做得更為確實。⁵¹

台灣實施公投屬內政問題，照理說美國無權干涉，但因公投可能衝擊兩岸關係，導致台海緊張，間接造成亞太地區的不穩定，不僅對美國反恐戰爭有所影響亦不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基於這些複雜的因素，美國決定強力介入。2003年11月下旬起，美國即已開始對台灣公投問題展開危機處理與預防外交，從要求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赴美解釋、並對立法院長王金平傳話不要讓「公投法」敏感條文過關，同時派遣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莫健訪台，並交給陳水扁一封私函，要求台灣政府在「公投法」表決時約束黨籍立委自制等，⁵²這些措施雖然是美國的預防外交，但也顯示美國對台灣的內政的強力介入，同時顯示中國大陸「聯美制台」的政策正逐步落實，相對的台灣獨立自主的空間亦遭到壓縮。

三、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台灣政策—雙緩衝國的困境

新現實主義理論強調體系結構的運作主要是由大國決定，在這樣的結構限制下，中小型國家無法影響大國的行為或改變體系的運作，只能選擇遵從大國的規範，或是退出體系或遭到淘汰。依據瓦茨的理論身處美中兩強之間的台灣應遵從美中兩強所構成的美中台三邊結構，台灣只能選擇遵守此一結構體系或是退出此一結構體系，問題是台灣不可能自外於美中台的體系結構亦不可能脫離此體系結構，只有選擇遵從這個體系的運作，這是台灣在地緣戰略的結構性限制因素。2001年到2004年的台灣因內部政權的爭奪，將突破美中台既定結構外部因素限制的作法轉換為爭取內部政治利益，從去中國化、一邊一國、制憲公投等行為挑動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最敏感的神經，⁵³不僅危及美國與中國大陸

⁵⁰陳一新，〈美國成爲強勢超強對美中台互動之影響〉，收錄《國際新形勢與美中台關係》，陳一新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3年），頁298-299。

⁵¹黃奎博，〈我國總統後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收錄《美中台關係戰略評估2004》，陳一新主編（台北：遠景基金會，民94年），頁12。

⁵²陳一新，前揭書，頁314。

⁵³陳水扁之台獨政策係因其認知台北能不能作爲美國心目中的戰略棋子，是由台北自己的國家戰略所制約的結果，台北必須讓華盛頓相信台北有意願與北京分治，則台北作爲華盛頓牽制北京的棋子才有意義，反之，若台北讓華盛頓感受到台北與北京有統一的趨勢，則對華盛頓而言台北就不具戰略棋子之意義。詳見石之瑜，〈起手無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動能性中的美中

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亦危及台灣的生存利益，同時台灣亦忽略了美國透過維繫台灣既有獨立地位與遏制台灣追求主權的兩岸關係策略，進行對中國大陸的牽制，⁵⁴台灣必須依美國的需要調整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台灣才有可能停止被看成是一個問題。⁵⁵台灣的政策溢出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假設—小國應依附於大國的體系，凸顯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限制。

台灣這種企圖脫離新現實主義結構的作法使台灣在戰略與軍事上正朝著夾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個大國之間的「緩衝國」方向發展，這是危險的警訊，⁵⁶如果將「亡國」定義為「國家失去外交自主權」，費卓（Tanisha M. Fazal）發現過去 200 年當中的 202 個國家，共有 53 個國家亡國，其中具雙強之間緩衝國身分者，亡國率是其他地緣位置的 1.41 倍，說明歷史上因為「雙邊緩衝國」的身分而遭亡國的機率較高⁵⁷而台灣正處於此一困境中。

小結

做為國際關係理論主流之一的新現實主義，承襲了古典現實主義人性本惡、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國家的行為出於理性、權力政治等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並針對古典現實主義的侷限予以修正，以簡化的方式從國際體系解釋國際政治的結構問題，使新現實主義理論更趨嚴謹，更具邏輯性，進而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儘管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理論，抽離了相關因素，招致國際關係學界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這些批評新現實主義的學派，如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其理論的立足點來自於對新現實主義的反思與批判，此一現象愈加凸顯出新現實主義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觀察小布希時期全球層次美中關係的變化，九一一事件前中國大陸取代前蘇聯的角色，這是國際

戰略棋盤》，《遠景基金會季刊》，4 卷 2 期（2003 年 4 月），頁 49-50。

⁵⁴Chia-lung Lim, "Lee Teng-hui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A Two-Level Game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29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May 28-30, 2000, p.15. 轉引自石之瑜，〈起手無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動能性中的美中戰略棋盤〉，《遠景基金會季刊》，4 卷 2 期（2003 年 4 月），頁 51。

⁵⁵石之瑜，〈起手無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動能性中的美中戰略棋盤〉（台北：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49。

⁵⁶周茂林，〈雞運南逢—亞洲南部戰略情勢回顧與展望〉，《國防雜誌》，20 卷 4 期（民 94 年 4 月），頁 38。

⁵⁷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No.4, 2004, pp.311-344. 轉引自周茂林，〈雞運南逢—亞洲南部戰略情勢回顧與展望〉，《國防雜誌》，20 卷 4 期（民 94 年 4 月），頁 38。

體系構成員權力地位的重新分配，改變了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形成了世界重心轉移至美、中兩強的新體系特質，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實力尚不足以完全主導國際事務，與美國抗衡，對於國際事務的處理，必須藉由歐盟、俄羅斯及日本的力量共同協助解決，這是構成員權力重新分配後改變體系，而改變後的體系反過來又影響了構成員的互動關係的印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建構全球反恐聯盟，藉反恐進行戰略布局，國際社會中各大國間關係隨之產生變化亦詮釋了新現實主義體系與構成員相互影響理論的合理性。

另外本研究以新現實主義理論中「權力平衡是必然形成的結果」觀察小布希時期亞太區域層次美中關係的變化，亞太地區主要的結盟行為以美中兩國為主軸，在彼此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形成各種形式的合縱連橫，而這些的合縱連橫，只是亞太地區美中權力平衡的另一種風貌，美中在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的角逐不會消失，只是轉換成某種型式而已。從美中雙方在九一一事件後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與競爭，印證了瓦茨所說的權力平衡現象一直存在國際社會中，只要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努力在無政府狀態求生存，權力平衡的情況便會發生。

綜合上述分析，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變化，印證了新現實主義結構體系及權力平衡的理論，唯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角色似乎有脫離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約束，即小國應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2003年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⁵⁸以擺脫美中兩強的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理論結構的限制—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兩強間的雙緩衝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結構理論的合理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念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全。

⁵⁸台北決策圈及知識圈部分人士認為當台灣對國家定位有了不同的選擇時，處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被动因應位置的台灣，將會有突破的機會，亦即台北對自己國家有不同選擇時，將影響到自己會不會成為美國的戰略棋子，換言之，台灣作為美國的戰略棋子，並不只是三邊互動下的產物，還與台灣本身的需要與實踐有關。棋子這種看似依附的角色，不是國際戰略結構強加於台灣的，而是靠台灣對自己國家定位的選擇所共同促成的。相關論述詳見石之瑜，〈起手無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動能性中的美「中」戰略棋盤〉，《遠景基金會季刊》，4卷2期，2003年4月），頁39-59。